

现代生活的症候与启蒙理性悖论

漆思¹ 孔妍²

(1.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2.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高度发达的物质成就, 与日趋显著的精神危机彼此间的分裂, 构成现代性生活的内在症候。两者不仅是共时态的历史事件, 而且存在历时态的逻辑关联。首先, 现代社会缘起于世界的祛魅, 这一方面导致主体意识崛起, 以及蓬勃发展的现代精神思潮与工业文明; 另一方面却导致以主体“自我决定”的需求向“决定他者”的需求为内容的主体意识失落。其次, 现代社会构建于依靠理性原则运转的科层制官僚社会组织, 这种组织形态可以保障工作效率与成本产出比, 却无法保障主体作为类存在的精神追求与道德规约。现代性生活的危机, 肇始于现代化发展的原初动力, 即“启蒙”本身的局限性。启蒙是对知识的求索, 但归根到底是对世界与人的控制, 它既能带来发达的现代文明, 又会导致对他人“自我”的控制与对伦理道德的忽视, 成为关于权力的话语。文章旨在考察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 从而发掘现代性的生活症结。

关键词: 现代性; 自我; 社会; 知识; 权力

中图分类号: C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7) 05-0016-06

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是个充满矛盾性的社会。它既拥有先进的现代化工厂、庞大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发达的现代商业中心, 又充斥着生产线上的异化劳动、毁灭性的世界战争与严苛的资本剥削。现代人生活于其中, 同时感受着蔚为壮观的新生事物与骇人听闻的浪费与破坏。后者又进一步折射出个体对现代社会生活图景既依赖又抗拒的矛盾态度。它一方面服从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组织原则, 使得自身得到生存、发展的能力与机会; 另一方面不愿屈于自身在社会生活中被压制、被管控的处境, 期望找到符合类存在的、本真的生活。这种现代化社会与现代人生活间的相悖状况, 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的总体性逻辑与个体发展的自主性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是现代性的生活症结的外在表征。想要对这一矛盾性的问题进行探究, 就需要考察现代性的发病机理。

一、主体意识的现代经历: 从复归到失落

现代性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关先锋文化的观念, 又可以被看作历史时间中的一个时代或一种作为社会状况的历史事件。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源头, 确立了以理性为内核的科学合法性, 对以神性为外观的宗教合法性的取代。自此, 启蒙理性的逻辑规律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意味着从关于宗教神学的彼岸世界到关于人的此岸世界的复归, 并直接导致绵延千年的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统一世界观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13@ZH021);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4CZD06);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L12DZX012)。

作者简介: 漆思,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 文化哲学; 孔妍,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专业方向: 西方哲学。

和君权神授理论基础的瓦解。从而，使主体意识重新回到摆脱掉“神学婢女”身份的哲学话语之中。可以说，是现代性的精神带回人的主体性，从而使人开创出之后缤纷多彩的现代文明社会。然而，任何事物都包含有自身的反面，当现代性的理性精神成为新的总体性话语之后，与其说它是对宗教的克服，不如说是在更高层次的反思性中对它的继续。如此一来，现代性自身就成为压制主体意识的新的霸权。由于文化与社会、规范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故而主体意识的失落在思想理论维度与社会发展维度各有其不同表征。思想领域中关于主体意识崛起与再次失落的反思，是将这一问题置于历史的语境并得以抽象思考总结。在17、18世纪的欧洲，自然科学取得很大进步，科学家们通过科学的途径揭示了诸多自然奥秘，中世纪以来教会物质世界的蒙昧说法不攻自破，伴随着民智日渐开放，教会再难维系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启蒙思想家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对专制制度及其精神基础——天主教会口诛笔伐：孟德斯鸠为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三权分立”学说；伏尔泰主张天赋人权，反对专制制度，强调平等自由，认为法律应以人性为出发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卢梭继承洛克的人民主权说，主张主权在民，并由公共意志理论发展出社会契约论。启蒙时代的学者不再像从前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借文学与艺术的形式来达到人性的复归，而是力图以理性思考与客观经验为前提，建立新的取代宗教依托的道德、美学与思想体系，从而提出一整套以理性为基础的思想理论、政治纲领与社会改革方案。宗教无法再提供文化统一性的原理，之后康德作为时代精神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提出知识、道德与审美领域彼此分离的观念；另一方面通过认识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确立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地位，保持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分野，主张对于客观知识有限度地认知。这无疑奠定了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为主体意识对于知识、道德、审美领域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黑格尔主张将现代性观念纳入历史哲学的框架，可以看做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历史化，“对康德来说，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尚未找到政治形式的文化现代性内里的启蒙经验。对黑格尔来说，现代性不只是启蒙，它还是与历史的一种关系……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是以一种表达了过去与现在的统一的方式来构想的，在其中，希腊文明、基督教、法国革命和现代国家形成了一个整体”^①。黑格尔强调内在的矛盾与斗争，在其理论体系内，存在、本质、概念都受到严格限定，这既实现了它们的自主性，又使它们不可能绝对地自主，按照这种思路，他勾勒出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新的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对古典伦理生活进行破坏，因而需要政治领域的国家来弥合市民社会的不足，这就构建成彼此否定的现代性图景。

从启蒙到黑格尔，中世纪被湮灭的主体意识通过理性的话语得以重建。主体意识的崛起表现为“自我决定”意向的增长，而主体间性的存在导致个人需求与公共需求间的差异与冲突，面对冲突，“自我决定”的意向就会发展出“决定他者”的意向；对于“被决定者”，主体意识再次被限制，而对于“决定者”，亦已然抛弃了启蒙理性关于平等、自由、博爱的原初承诺，成为新的权力拥有者，导致主体意识趋向失落。这种状况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体现，面对主体意识得而复失，后继思想家有不同的理论路径，一条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走向主体意识的虚无主义，另一条以马克思为首，为解决主体意识的失落问题开创出社会批判理论。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本质，知识是意志的工具，理性及其表现形式只是意志的客体化。意志表现为永远无法满足却又无处不在的欲望，因而人总是由于欲求不满而感到痛苦。表象间受因果必然律相互影响，但意志对表象的影响则如命运一般，既超乎因果律，又无法躲避。因此，基于这种彻底的宿命论，主体只能在自我意识的失落中沉沦，这就走向了悲观的虚无主义。尼采赞成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认为理性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幸福之后理应被抛弃，这样尼采的哲学就进入否定传统价值、观念、真理等一切目的性的“彻底的”虚无主义，但他没有使主体意识像叔本华那样走向消极，而是提出“超人哲学”，梦想成为“新的人”，这种人拥

^① 杰拉德·德兰蒂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页。

有强力意志，可以自己作为自己的尺度，崇尚象征激情与欲望的酒神精神。尼采几乎将西方传统价值观颠覆殆尽，却也成为之后法西斯等极端分子的理论魁首。

马克思将主体意识的失落归于现代性自身规划的矛盾。对此，他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不难看出，马克思将批判的焦点从康德的认识论与黑格爾的历史哲学，转向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及其支配体系，面对工具理性与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僵死机械模式对人性的压制，他没有像叔本华、尼采等人一般陷入玄思并走向虚无，而是立足于主体意识失落的时代背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分析，来开创一种解决时代问题的实践理论，从而践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指出，现代性以理性精神为核心，开创了发达的科学技术并摧毁了落后的封建制度，由此建立起现代化的机器大工业与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无疑肯定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智慧，且导致社会走向形式上平等、自由的新型政体。但是，人们并没有感受到生活的幸福，事实上，无产者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为了满足生计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机械化工厂的生产线上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作为主体的本质需求完全被冰冷的机器湮灭，只能麻木地生活在城市的贫民区中；而资产者生活的所有目的都在于更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金钱作为中介，商品以拜物教的形式控制人的欲望，而能够关怀主体意识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商品与资本的面前则不值一提。面对这种主体意识失落的事实，马克思用异化劳动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这种看似平等交换劳动力与佣金的生产关系，使得劳动者被固定在被剥削的位置，而资本家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这才是导致现代性背景下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的根本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发展与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统治目的与获利原则，建构出一整套资本交换价值体系与社会运转机制，用程序化的合理性来隐藏资本剥削的本质，使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主动让渡自身的主体意识并服从于资本运转逻辑与社会组织程序，“物的逻辑”从而以更为隐性的方式将人与自己的类存在相异化。在这种状况之下，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剖析与批判，才能揭示表征为专门高效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实质上的阶级性与非人化。

二、社会组织的现代架构：从专门高效到去道德化

现代社会组织是现代人的生活得以展开的场域与纽带。尽管启蒙理性承诺给予我们一个自由的社会，但结果却是一个日益非人格化的社会。现代科学导致学科门类专门化，现代工厂要求生产技术专门化，甚至政府职能部门也践行科层专门化，这样现代社会就自然而然地促成了现代人的“角色专门化”。在各个组织内部，通过规范的等级制度、工种的专业要求、详细明确的分工、定额工资配比、依序升迁制度等规定，角色专门化被广泛推广。这一过程合乎理性法则，它意味着“社会的动向就是日益增长的官僚化（或功能理性）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功能专门化就意味着个人日益脱离他对自己所参与的事业的控制……由于受到效益定额、可预测性以及专门化的制约，人成了这台官僚机器隆隆运转程序的附属品”^③。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社会组织属于公共领域，个人生活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③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40页。

于私人领域，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发生冲突，就需要通过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进行调和。但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环境中，国家只会通过为公共领域提供一系列合乎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法规，而对作为生命主体的人则缺乏本体性的关怀。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在道德伦理上是盲目的、纯形式的，缺少合乎人的本真存在的内容。

社会的去道德化，意味着人性的因素从社会运作的原则中退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障现代人的本体性安全，从而尽量克服紧张、焦虑、压迫感等现代特有的心理症状，只能依赖对于非人客体的可靠性的信任。如吉登斯所言，“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①。在前现代社会，由于土地、血缘的束缚与空间、地缘的限制，人们生活在彼此熟悉且发展缓慢的熟人社会，可以通过家庭、族群来得到信任，从而保障人的本体性安全。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②。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在给予人前现代时期所没有的人身自由的同时，也用资本与金钱破坏掉了亲情、信赖与宗教信仰。但是，人作为不同于动物的类存在物，先天具有找寻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的需求，因而现代社会组织就将人性所需的依赖建立在关于客观技术性知识的抽象原则之上，这个抽象原则即现代专家系统。

对专家系统的信赖建立在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道德品质的信赖之上。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们的日常生活被高度组织化，生活与工作设施高度现代化，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要想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必须依赖现代专家系统。但专家系统的内在矛盾在于，其衡量标准是合理性的、纯形式的，但其构成要素却并非机械装备，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社会组织对专家系统的依赖基础，是专家的“无错性”，这首先造成对“专家”本人的主体性的破坏，因为人本身并不是机器。此外，当正确性原则与道德原则相冲突时，须首要保证正确性原则，这就造成了专家系统的去道德化。专家系统的运作可以保证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常运转，而现代人的本体性安全也依它而存：正是专家系统的可依赖性，保障交通运输业与通讯业的发展与维持，现代人间的人际交往与联系全赖于此，同理，医疗、教育、金融、保险，现代人生活质量得以保障的所有领域都建立在纯理性、纯形式的专家系统之上。当这些方面都确保正常以后，现代人自身对于专家系统的道德化与否已然不再关注，可见，专家系统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用以辅助资本运作，从而将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的手段。社会组织，包括社会组织下的专家系统的去道德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性的生活症结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现代架构，明确的阶级属性与鲜明的目的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不论是高效专业的专家系统还是分门别类的官僚机构，皆是为保障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稳定运转的技术手段。这种组织机构的设定模式，从根本上是为了将社会成员纳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运转机制，从而一方面符合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要求，另一方面配合资产阶级对于社会其他阶级的统治要求。这种将“合理性”与“控制力”相媾和的社会组织形态，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症候，要想对其辩证认知，则需要回到它的逻辑起点，即启蒙理性的内涵逻辑，来对之进行解释。

^①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三、启蒙理性的现代历险：从祛除蒙昧到权力话语

现代性的思想内核与现代性所给予人的生活，之所以被反复考量，归根到底在于它所提供的社会并非它最初所承诺的社会，“我们的文明的思想基础很大一部分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后果。然而这个进步本身又产生于为某些原则所作的斗争——这些原则现在岌岌可危，比如个人及其幸福的原则。进步有一种倾向，即破坏它恰恰理应实现和支持的那些观念。技术文明危及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身”^①。于是，个人成为工业社会发展的附属品，现代人不得不面对一个衰退的自我。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高效的管理模式，现代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处于现代性生活场域中的人们，除了迎来看似丰沛的物质条件与先进技术能力以外，还迎来了主体意识的失落与过度组织化的社会，从而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越来越无法对抗资本的集中与社会的集权。关于启蒙的现代性，既是一种作为文化冲动的观念，又是历史时间中的一个时代，它是关于“过去的未来”的文化思潮，即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所作的对于未来的规划，当时的未来就是我们的当下，因而关于现代性下生活问题的发病机理，不仅要考察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生产模式、社会组织形态等派生物，更要考察现代性诞生的前提，即启蒙本身的局限性。

启蒙是对于知识的求索，其最大功绩在于开启民智，使人得以从中世纪神学的蒙昧信仰中解放出来，从此以后，科学作为追求精准性的程序而独立为一种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以求真为目标，只关注手段而不关注目的，并不涉足价值问题等形而上学领域，从而成为实现现代社会控制功能的基石。可见，启蒙作为对于知识的求索，其手段与目的都具有去道德性，它遵循因果必然律，以不断进步作为自身推动力，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并应用于生产与生活，就导致人性让位于理性，幸福让位于发展，个人让位于组织，工人让位于机器，最终以发展、进步、效率为依据，造成属物的世界对属人的世界的控制。但是，启蒙作为抽象理念，它的践行必须依赖具有主体性的人，换言之，启蒙对于知识的求索归根到底是人对于知识的追求与占有。人作为合目的性的类存在物，与机器完全不同，机器按照科学理性的精准性程序运行，只涉及效率的高低；而当人遵照科学理性原则行动之后，则成为只追求精准性而抛弃道德性的存在。随着生产的发展与机器的普及，必将有一部分人沦为机器的附庸，而另一部分人则可以控制机器，乃至控制剩余的人。这样，寻求知识就成为了运用权力，先是控制事物，再是控制人。从培根喊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知识与权力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现代性的母题。

启蒙为宗教神学祛魅，也就把衡量人的价值、意义与命运的标尺放归到自己手中。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时代，上帝作为“至善”来充当形而上学的终极指向，而现代性之后，这一角色需要由启蒙理性来担负。理性的本质是依据客观事物概念、判断、推理的合逻辑行为，其主体是人，行为目的是获得知识。知识是通向权力的手段，途径在于建立同一性的知识体系或理性体系，即依靠科学理性建立一套服从精准性要求的求真系统，从而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事物或人列为对立面，对其或者同化或者消灭，以期建立合乎同一性的社会：机械化工厂、科层制社会组织、消费社会下的商业中心，乃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无一不是这种理性唯知识论同一性的产物。同一性将导致竞争，因为在这些现代场域中，启蒙最初赋予每个人“自我决定”的权利都可能演化为“决定他者”或者“被他者决定”，人不论出自本能还是欲望，都期许决定他人，而权力即是决定他人且避免被他人决定的保障，因此同一性的自由理性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权力社会，但当权力滋生之后，这个社会也就不再是启蒙所规划的自由理性社会了。这个社会在正常运作时总表现为技术效率和规划计划，或是物资丰沛与文明发展，但是其内部却已然包藏着摧毁启蒙的逻辑了。

鲍曼以奥斯维辛为例指出，“大屠杀弥散于我们集体记忆中的那种无言恐怖就是要令人痛苦地去

^① 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8页。

怀疑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①。我们熟悉的一面即指工厂体系、原材料、产品及被运输的货物，而它的另一面却是作为工厂延伸的奥斯维辛、作为原材料的犹太人、作为产品的死亡以及作为被运输货物的新的被迫害者，整个计划就是扭曲了的高效官僚体系与现代科学精神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纳粹暴行竟然完全符合启蒙理性所创造的文明。科学技术、官僚组织、专家系统、效率原则，启蒙理性所给予现代性的各种原则，在道德伦理上都是盲目的和纯形式的，除了追求进步与扩张的同一性野心之外，并无任何关于人的本真存在的道德关怀。

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当然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它却是必要条件。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与现代管理制度的组织成就，才使得如工厂生产线般批量生产的死亡得以可能。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把文明和野蛮想象成对立面是个错误……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它们还没有，同时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②。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它的反面，启蒙也不例外，科技进步、效率高速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与物质的极大丰富，但同时就意味着片面进步观之下对于伦理道德的忽视，启蒙的局限性正在于由此延伸的知识、权力与自我间的矛盾，自我期望通过获得知识来拥有权力，从而使自我意识得到最佳表达；但自我权力的行使即是对于他人的“自我”控制，将造成他者自我的缺失；而当自我致力于获得知识或权力时，实际上已然跌入了知识的理性逻辑，只能按照理性世界的社会规则与组织程序来行动，同样意味着自我的丧失。关于现代性的发病机理，从表征上讲是在于主体意识的失落，从程序上讲是在于社会组织去道德性，但其根本内核则在于启蒙本身的局限性。只有对这一内在机理深入认识，才能深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现实的生活困境，并得以从关键性的切入点出发，来找寻解决之道。可见，现代性的生活景象一方面反映为左右生存处境的微观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构成传承时代历史的文化记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活经验经历了一个由开放到闭合的过程，“开放”体现在其文化框架内部可以滋生并包容反对性的内容，而“闭合”则体现在对立面的一体化，即否定性、批判性力量的消失。要想走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关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悖论，就需要在深入辩证地了解其源起与走向的基础之上，立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从而具体地、历史地分析资本逻辑与启蒙理性的内在症结，避免陷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一性幻象。

责任编辑：马 妮

^① 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② 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3页。